

亲爱的，你把情欲变成消毒水了！

何春蕤

医学和性教育人士把《豪爽女人》当成洪水猛兽

三月十七日「生活周报」刊出了郑丞杰医师一篇五千余字的长文〈好坑斗相报？抑是诅咒乎别人死？〉，对《豪爽女人》书中的女性解放立场多所质疑，该文且在次日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的年会中分发并宣读。后来三月二十四日在另一版又刊出了赵坚医师的〈谢谢你，何教授〉一文，更进一步以反讽加恐吓的方式批判女性情欲解放。

许多医学和性教育人士把《豪爽女人》当成洪水猛兽，而且为了说服一般人（特别是女人）不要阅读此书，不断提笔为文或者在公开演讲中激动的驳斥女性情欲解放之说。《豪爽女人》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女人需要解放情欲？这些答案有待读者自行去面对此书。但是，郑医师和赵医师的论点多多少少代表了医学和性教育人士的某种眼界，我在此针对其主要的论点作

答，提供全社会作为公断。

强调生物生理观点的执着，到底掩藏了什么秘密？

任何医学科学都带着历史的烙印，多多少少都会反映出当下社会的性别成见，可惜我们的医学专家们鲜少对自己的专业 and 这个专业的性别成见加以反省批判；相反的，他们热烈的拥抱自己的专业权威，不断诉诸他们所谓「先天的生理差异」来划分两性在情欲上的需求和表现。

于是，当女人要求更多情欲选择与经验，肯定女人也可以发展情欲需要，也可以好色时，郑医师立刻强调，男人血液中主宰性欲的荷尔蒙在浓度上比女人高一、二十倍，也就是说，男人的好色并非完全是社会文化的鼓励所造成的，而是有先天的生理为基础，男人好色因此是「天性」。这个科学证据的另一个内在含意就是：女人血液中的性欲荷尔蒙浓度 然很低，那么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退缩、被动、冷感等等女性情欲表现也是「生理」使然，而不能全然归罪社会文化。在这个逻辑之下，豪爽女人的好色因此是违反天性、违反生理常态的特例，而作为特例，她们的情欲模式就不应该被鼓励

或推广。

可是即使女人的性欲荷尔蒙浓度比男人低，难道这就表示她们无权尝试追求丰盛多样的情欲生活吗？我们从不因为一个人失明就断定他不应被鼓励继续读书求知，我们从不因为一个人肢障就断定他不应被鼓励打球、就业、旅行。事实上，我们不但鼓励他们尝试突破，并且积极提供资源，改造社会环境，以便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很显然我们已经承认，社会资源的重新调整分配和社会文化的改造提升，可以克服我们的「先天局限」。

然先天的装备并非发展的极限，那么为什么当女人要主动改造情欲文化的品质，要发展她们好色的能力时，医师们就立刻祭出生理生物观点，要女人顺其「自然」呢？再说，即使女人先天的性欲荷尔蒙浓度比男人低，比较不好色，但是，从小我们就被教导「人定胜天」，「以后天的努力来克服先天的局限」，只要女人积极努力，她们一样可以在后天发展情欲能耐，成为好色的豪爽女人。这么看来，生理生物观点显然只是一个限制女人的人生选择，以说服女人不要好色的说词而已。

保守的医学专家当然明白过分强调生理观点会站不住脚。生理观点无法

说明具有相同生理器官和性欲荷尔蒙浓度的两个男人之中，哪一个会早泄，哪一个会偏好肛交，哪一个会热爱女伴的脚踝；生理观点也无法解析为什么有些男人能够无性低欲度日，而许多女人可以五、六次高潮而情趣不衰。面对这么广泛而明显的个别差异，生物生理观点立刻捉襟见肘，因此就连最保守的医学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还有社会文化及个人的因素在其中施力，影响两性的情欲发展。

可是，即使认识到生物生理观点的局限，保守的医学和性教育人士还是不断加强生物生理观点的正确性与重要性，这种执着到底掩藏了什么秘密？

一夫一妻自私排他的性爱模式从来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人性

或许我们可以在郑医师的文中找到某种迹象。郑医师在文中多次提到「两性先天的生理差异」，但是他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说：「真平等应该是基于先天生理上不平等的事实，再追求后天各种人为的平等，而多照顾女性、给予女性方便、让她们能够发挥各方面的潜能，这样才是分方位的『好爽』」

女人。」在这段听来宽大胸怀的话语中有一个小动作：原本的「先天生理差异」不知何时变成了「先天生理上的不平等」，而正是在这个语词变化中让我们看出了性别歧视的玄机。

从「生理差异」到「生理不平等」的转换包涵了一个社会运作的过程：如果医学科学真的中立客观，那么，「差异」只是「不同」，而不能引申为带有价值判断、优劣高下的「不平等」，更不能引申为牵涉到权力、地位、机会、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女性主义者从未像丑化她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否认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但是女性主义者绝对反对以生理差异来命定个人可以选择什么人生道路，更反对把「天生如此」或「自然有别」延伸为对个人情欲开拓所施展的限制与压抑。

在人类克服自然局限，奋勇促进人人平等享受丰盛生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的郑医师却偷天换日的把生理差异延伸为生理不平等，为男人的优势和女人的弱势提供正当化的解释，然后再来故示恩惠的表示男人会保护女人，这真是父权最惯用的手法之一。以此看来，保守的医师和性教育人士热烈拥抱生理生物观点，主要还是为了用科学「事实」和专业术语来局限女人的情

欲发展，掩盖父权制度的不公义和不平等。

此外，所谓生物观点也常常自我矛盾。比方说，生物生理观点说早泄是雄性动物的「天性」，也说杂交倾向是人的「天性」，在这些论点上，医学及性教育人士绝不会劝人「顺其自然」；可是，在企图证明两性情欲的需要和能力有先天差异，以便正当化男人的好色并且劝女人不必尝试好色时，医师和性教育人士绝对对死守生物观点，说这些差异是「天性使然」。而当情欲的发展直接挑战现有道德规范和婚姻束缚时，专家们又立刻舍弃生理生物观点，大声谴责自在开放的情欲活动是只注意「人类的动物性」，也就是只注意人类的生理生物需求，而忽略了「万物之灵的人性面」。

当然，此处的「人性面」绝不是指情欲人权的尊严，也不是情欲活动中双方的平等资源与互动，更不是人类追求自我实现和多元多样人生经验等等以情欲正义为目标的人生取向。相反的，所谓的「万物之灵的人性面」在郑医师的文中指的就是「自私的、排他的性爱」这种压抑他人、局限自我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据说是以（一夫一妻）婚姻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一夫一妻、自私排他的性爱模式从来就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人

性，因为历史和人类学都指出，许多民族（如爱斯基摩人）和许多时代（如过去的群婚时代）都没有这种「人性」。不过，按照郑医师的逻辑，如果人是「万物之灵」，那么他们不但可以超越动物性，同时更应该透过理想和情操来提升自我，超越利己的自私心胸，超越「自私、排外」的低劣人性，而达到「开阔、容他」的高贵情操吧！这么一来，我们倒想不透，为什么一心要提升人类情欲水平超越动物性的郑医师，会继续不断肯定「自私、排外」的低劣「人性」是人类情欲发展的极限？或许答案是：郑医师所津津乐道的动物性和人性之分，并没有什么 正的高下之别，而只是用来抬高婚姻的说词而已。

所以，关键问题还是在性与婚姻之间的关系。

对婚外性的焦虑恐吓，使婚内婚外的性品质都无法提升

保守的性道德当然认为性与婚姻应该全然重迭；换句话说，性必须以婚姻为唯一场域，任何婚外性（包括婚前性）都因此变成被诅咒的行为，而「自私的、排他的」婚内性则成为保守的性道德所推崇的情欲模式。

相信性与婚姻应该重送的人或许会说：「我们彼此的关系不是自私、排他，而是一种执着，一种承诺，一种对彼此负责的做法。」这种建立在双方意愿上的投入当然是美事，但是，当这种个人的人生选择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以法律、教育、媒体强力推动实施的唯一生活规范及道德标准时，它在集体层面上的恶果也明显可见了。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恶果就是：婚内性之所以能在道德尺度上居于优越的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在各种性模式的「公平呈现」中被多数人欢欣自在地选择为自己的偏好。（我们连谈「性」的时候都一定联想到「婚前」、「婚外」、「婚内」，以婚姻为基点，这正是婚姻霸权的征兆。）事实上，与其说婚内性是因为自身某种可取的特质而受欢迎，倒不如说它是在其他的（婚前和婚外）性模式遭受持续丑化抹黑之中爬升为优先选择的。

毕竟，如果婚内性真的那么美好，那么合乎「人性」，我们又何必需要灌输责任和承诺的重要，用压抑、监督、情感勒索等等负面力量，甚至法律的规范，来「确保」婚内之人坚守其选择？如果婚内性真的这么可取，我们的社会文化又何必透过医学及性教育人士的各种警语和「关心」，不断努力

在尚未选择它或执意抛弃它的人心中制造出那么多罪恶、羞愧和恐惧？为什么不让婚内性的光芒自然吸引他们呢？

婚外性并不一定比婚内性来得爽，婚内性也并不一定比婚外性来得美好。我要强调的是，当我们用恐吓、罪恶、焦虑、道德来禁制情欲的自在发展，当我们强烈要求情欲活动必须在婚姻的框架之内进行时，我们已经扼杀了整体情欲文化细致发展的空间，从而使得婚外婚内之性活动的品质一并无法提升。

试想，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因为历史文化过程中持续的积累发展，开创运用，讨论改进，因而更加细致优雅；反观性的活动，承载着各种道德的、情感的、责任的、权力的重担，没有正面的积极的鼓励力量，没有资讯经验交流的自在管道，被焦虑、恐惧围绕，被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穿透。如何能奢望性活动和性文化有什么好品质呢？

先承认自己很坏、很兽性，

以此规劝女人「不要降格学男人」的诡计

而当豪爽女人挺身投入开创新的情欲生态，以自在的愉悦来取代敌意和畏缩之时，郑医师的反应居然是：女人应该不要「降格以求去争做男人做错了的事。」

过去一有女人开拓新的女性人生选择（比如专心事业、独立自主等等），就会有男人不屑的说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女人想学男人、想做超级女强人而已。现在比较高明的策略则是，一有女人开拓了更新的女性人生选择（比如开发情欲能量、累积情欲经验等等），男人便满面关怀地先承认自己很坏、很兽性，说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好，以此来劝女人「不要降格学男人」。

这种策略其早就有别人用过了。父母炒股票、上酒店，但是禁止子女玩电动玩具或去 KTV；高官打高尔夫或利益输送，但是禁止百姓开垦山林或自力救济；这些场合中我们都听到过类似的说词：「我们做得不好，你们千万别学我们」。其实翻译出来，他们真正说的是：「我们苦心建立的权力不平等生态不能被你们介入而搅扰，权力是不能分享的」。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因为，州官的优势和权力正建立在「垄断」之上；同样的，男

人劝女人不要涉足情欲也是不希望女人改变现有情欲文化中的不平等权力生态。

提出「因性而起」的疾病来警告女人，
是软硬兼施都无效之后，最后可用的一招？

如果软硬功夫并施，威吓苦劝都阻止不了女人肯定女她们的情欲人权，医师和性教育人士还有最后一招可用。那就是提出各式各样「因性而起」的疾病来警告女人。在这一点上，郑医师比起在他后面跟进的赵医师可敬得多，因为郑医师充其量只敢断言性病、子宫颈癌、爱滋病与某些性行为之间「可能」有关联；赵医师则一杆子把所有和女性生殖系统有关的疾病和感染全部算到「性观念解放」的头上，令诸多不幸染病而性观念又不解放的女性「含冤莫白」。

从行文的语气来看，与其说赵医师是从专业的观点提醒妇女同胞们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倒不如说他是借这篇短文表达他个人对妇科疾病痛恨的痛恨。（而他还自称是「服务妇女健康与疾病」的！）我们无法想像一个心脏科的

医生以如此强烈的道德情操来谴责一个爱吃肥肉的病人，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泌尿科的医生以同样的恐吓语言来警告一个长期憋尿的病人，可是，我们有点担心赵医师会用何种眼神来逼视在他面前的妇科女病人（不管她们是何致病的）。

正是这种缺乏医学专业精神但充斥盲目道德义愤的态度，才暴露出国内某些妇产科医生「关切妇女健康」的真正动机。他们并不思考是什么样反性和反情欲的文化使得女人与她们的身体隔绝，连照顾自己的卫生和健康都讳言；医生们也不反省是什么样的性别偏见，使得他们的专业视女人的生殖功能为首要关切，而从不理会女人在身体和情欲上的感受和需要。总之，她们对女人的社会处境没有兴趣，对女人情欲出路的关切则只是重「量」（女人不可有太多性伴侣）而不重「质」（只要伴侣固定，情欲品质不佳也应该「体谅」）。

此外，医师和性教育人士经常用性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来证明某些情欲模式很「危险」，其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郑医师文中所提：子宫颈癌和太早开始性行为以及多重性伴侣「有关」。不过，任何一个对统计学有点常识的人

都知道，「有关」只是相关系数的表现，并无「因果关系」的暗示；而且有说法指出，台湾地区妇女罹患子宫颈癌的比例偏高有可能是和此地男人大多没有割包皮、个人卫生没有做好而导致细菌感染女伴有关。另外，太早开始性行为或多重性伴侣这两个因素被独立出来，而没有询问在性行为过程中，男性（不管是丈夫或是其他男人）如何进行性活动或如何对待女性的生理器官，这种选择注意「量」而不探究「质」的做法再一次显示研究方向及其「成果」的预存偏见。

性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联尚有待证明，不过，即使某种情欲生活方式有可能导致疾病，这并不表示这种情欲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就好像不规律的生活方式虽然可能致病，也和道德与否无关。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她想要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性学大师是移风易俗，我们的性学大师是复制现状

女性主义者对男性价值观主导的医学及性教育强烈质疑时，我们的性学名嘴们经常搬出权威的后台来。据郑医师说，他们所引用的「性生理知识」

大都来自「当代性学大师马斯特和琼森在五〇、六〇年代所做的大规模科学化研究」，金赛报告也是被引用的权威之一。可是如果我们切实理解这些性自由派大师的著作和他们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我们岛内自命性学大师或性教育专家的人，距离这些五〇、六〇年代研究者的眼界甚远。

让我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这些研究者虽然各自在某些方面受限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在当时全都是改造社会文化的进步分子，对松动当时的性压抑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比方说，金赛的研究彻底扭转了西方社会对婚前性行为及手淫的负面评断。他的研究指出，青少年不但可以透过手淫时的性幻想练习人际互动，更应该借着婚前性行为开始操练，以便适应日后的婚姻生活。金赛在同性恋的议题上也展现了当时少见的开明态度，视同性恋行为为情欲选择的一种，而非病态。这些进步的主张甚至导致他在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中屡受迫害。

马斯特和琼森的研究则是出了名的女性主义立场。他们二人在研究中发现女人有无穷的性愉悦能力，远比男人更为广阔多样，根本不是主流文化中描绘的薄弱冷感，因而主张性的愉悦和满足绝非男人的专利；相反的，女人

有绝对的「高潮权」，这和本土女性主义者「我要性高潮」的口号是异曲同工。具体的来说，他们认为女人在一切性活动中都至少应该掌握一半的主动权来经营情欲活动的内容和节奏，而男人在其中的性责任则是必须学会控制自己射精时间来完成双向的愉悦。

比起这些四、五十年前就已经以清除压抑、追求愉悦，改造社会文化为研究目标的美国性学大师而言，我们的医学及性教育人士似乎只有生理生物学的「事实」和激越的道德义愤。他们似乎只关心继续维持现行社会的保守价值观，正如本地的性教育领导人所说：「性教育是为了要产生社会和道德所接受的行为和态度」，也就是巩固及强化现有的（性压迫的）体制。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性学大师只是亦步亦趋的复制现状，而不是像他们所引用的西方性学大师那样，移风易俗，推动进步开明的新道德观，追求各种性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平等多元。

面对性学和性教育这种支持现状的倾向，深受性别压迫和性压抑双重迫害之苦的女性，特别是身为改造社会之先驱的女性主义者，逐渐看清楚自己的解放要靠自己。如果我们的性学和性教育以专家挂帅，以主流的父权道德

为纲领，那么，就让我们的妇女运动者发动一个全新的性学和性教育，以每个个人的情欲经验和情欲狂想挂帅，以不带畏惧的健康和愉悦为纲领，积极改造我们的社会文化吧！

「好坑斗相报」或是「诅咒乎别人死」都不过是情绪反应的说法而已，且看什么人以什么论述来促进社会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吧！

（1995年4月14日中国时报家庭版）